

跨国空间下留学生工人的劳动同意

摘要

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留学生降落在异国他乡的国际机场，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勇敢地将自己置于全球化的洪流恶水之中。随着国际和国内政策环境日趋开放，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留学生数量迅猛增加；《2016年中国留学生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留学生群体已经超过126万人，在占留学市场份额最高的六个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中，我国留学生的数量均排名首位，我国是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在大多主要的留学目的国中，留学生被赋予了有限的工作权利，由此留学生与留学目的国之间不仅仅是教育服务消费者和提供者的关系，留学目的国一方面从工作时间和工作类型上对留学生的工作权利加以限制，如澳大利亚学生签证持有者可以在学期内每两周工作40小时；另一方面将“在地雇主-留学生工人”劳动关系置于与本地劳动力市场规范相同的法律体系下加以保护，在特定的地方制度和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具有独特意义的跨国劳动力市场。

从2015年开始，我开始频繁地接触在澳大利亚悉尼市的留学生工人，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注意到留学生工人的职业主要集中在全球化逻辑下具有“中国性”的、在劳动力市场分割逻辑下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如中餐馆、代购店和家政公司等；留学生工人糟糕的劳动权益状况和恶劣的劳动条件与他们顺从工作安排、努力工作的意识形态和行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他们处于不稳定且艰苦的非正式工作状态中，接受着远低于最低时薪标准的工资、超过签证规定时间加班工作、时常受到雇主的剥削；另一方面，留学生工人服从雇主的工作安排、努力工作，当他们完全有理由对雇主非正规甚至是非法的行为向有关部门申诉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沉默，甚至主动降低工资标准、帮助雇主在可被监察的领域形成“看上去合理”。我不禁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如果说布洛维在“制造同意”中所阐释的工人在劳动场所内的同意是基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对劳资关系的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业公民地位，那么作为不具有同等工业公民资格的留学生工人的劳动同意是如何产生的呢？跨国空间下具有相似文化认同的在地雇主和留学生工人在资本密集程度、行业特点、劳动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与既有的跨国移民工人研究所关注的文化多样性和社会流动存在明显区别（周敏，1995；藍佩嘉，2011；项飏，2012），这些差异是如何形塑工作场所内的劳动过程的？

本文以澳大利亚悉尼市中餐馆和华人代购店的留学生工人为例，探讨留学生工人在跨国空间下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同意问题。第一，语言障碍是年轻的留学生工人主动选择“中国性”工作的主要原因，这种“中国性”主要是指工作语言为中文，可能的附生属性为雇主为华人华侨（如中餐厅）或者工作本身与国内有密切的联系（如代购店）；由于留学生工人所拥有的社交圈子非常有限，基本上与更大的华人移民社区隔绝，较短的签证时间、工作权利限制和相对孤立的状态使得留学生工人没有较强的向上流动的意愿。第二，在生产场所内，留学生工人在不受保护的劳动状态下、面临雇主的非正规或非法对待仍然接收工作安排、努力工作的原因可以被归结为“排班游戏”（the game of shift arrangement）。一方面，“排班游戏”缘起于留学生工人劳动力市场供需高度不平衡，通过“排班游戏”有效消解了留学生工人劳动过程中在薪水、连续工作时间和超时工作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劳资冲突，甚至在留学生工人间生产了支持、认同和忠诚；另一方面，“排班游戏”成为劳动控制的重要手段，通过支配留学生工人的工作时间选择和工作时长，不仅减少了留学生工人的流动和留学生工人退出可能带来的损失，而且通过向留学生工人安排超出工作时间限制的方式，避免了留学生工人向劳动监察部门控诉雇主的非正规甚至是非法的行为。对留学生工人劳动同意的研究可以为跨国移民工人研究提供实证经验，通过刻画了跨国空间内部劳动力市场，拓展了以往关于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的研究。